

第五節：從事分流教育改革時所將面對的實際問題

大體而言，目前僵化的高職、高中七與三之比的體制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已使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我國的中等教育分流體系應當全面改革。基本上強迫分流有礙人在各方面的正常發展，不符合教育理想。好的教育應首重「教育的本質性目標」，以充分發展人的才性，培養健全人格為第一義。我國的強迫分流教育體系原本為了經濟目標而建立，從一開始便忽視正常的教育目標，而以人為社會的工具，其流弊實在甚多。同時我國的分流體系雖然為了經濟目標而建立，在早期也有一定的經濟效益，然而，近十五年來既未能配合經濟結構的巨大轉變而調整，也忽略了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中，應該盡量多依靠市場機制自由調節而減少管制的道理。近十餘年來，高職教育的經濟效益日漸低下。隨著經濟與人才需求水平提昇，高職教育日益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其所佔之中等教育的比例應接受市場的調節，大幅降低。另外從社會的層面出發，強迫分流教育促使階級複製，使人的出身與社會地位之不平等益形惡化。過早分流與升學主義所造成的惡性競爭又使人感情疏離。兩者均有害於民主社會的正常發展。適當延後分流，並大幅增加技職系統的升學機會，雖然未必能夠大幅度改善上述問題，至少能使問題減輕。無論從教育，經濟與社會等角度來看，我們都贊成全面的改革中等教育的分流系統，大幅降低「技職教育」在中等教育階段所佔的比例。

然而我們同時認為技職教育對於發展個人的技藝性才能，鼓勵「從實做中學習」，以及給予人們多元的發展空間等方面，本有其積極的價值。現代的實務取向教育，更應注重藝術精神的培養，與工藝品質的講究，以全面提昇文化水準。然而過去幾十年來，重知識而輕視藝能的思想，卻使技職教育的品質受到政府與社會的輕視與忽略，而逐漸淪為「次等人」的教育。技職教育實應正名為「藝能教育」，以有別於只是訓練人就業的「職業教育」。我們不能在輕視「藝能教育」，與偏重知識與理論教育的大環境下，一味提倡延後分流。那樣只會造成學生們集體湧入以理論知識為主

的普通教育體系，以致升學主義及惡補全面升級，同時產生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失調問題。而所謂的市場自由調節功能，在面對數千年崇拜讀書人的傳統下，亦恐將無能為力。中部地區試辦綜合高中，幾乎全部學生都不顧性向、能力、乃至出路地選擇考大學的路，便是這種情形的警訊。

自由派與理想主義派的人士，認為我們應維護學生自由選擇的權利，所以要盡量延後分流；教育體系應盡量一元化，內部課程則多元化，以全面增加其探索個人才性與選擇未來方向的機會。至於學校的數目，課程的安排，以及就業與經濟問題，則應由市場自由調節，不勞政府擔心。這其中不僅有其可敬的理想性，也道出了自由民主、活力充沛的現代社會所應有也必須有的一些教育原則。然而，我們如果仔細考察我國的現實狀況，則不禁對於這些理想是否能落實，深感憂心。盡量提供自由選擇的機會，目的在於讓學生充分去開發其個人的才性。然而學生一窩風的湧向普通高中與大學，主要卻是為了文憑與社會評價。與發揮個人才性，渺不相涉。輕視實務與技藝的心理若不改變，自由主義在我國不但不能創造一個多元和諧的社會，反而會製造種種的困境。過去的包袱加上現實的困難，我國的分流教育體系到底要如何改？不免仍有以下幾種主要的爭議。

一、.高中階段藝能教育的位置？

在從事分流教育之改革時，我們所面對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技職/藝能體系的存廢或安放的問題。這也是考量新的中等教育結構，所首先應當面對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羊憶蓉等人主張：

- 1.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應該以普通教育為主，而勞動市場上所需的技能，可以考慮由學校外的職業訓練機構來培育，以因應技術進步對各種新技術人力的需求。
- 2.從實證得知，高職的職業訓練並未使學生在就業市場上佔有優勢。因此分科制的高職教育實無存在的必要，而高中、高職也無理由持續維持固定比例。
- 3.高中職的留級制度的確造成一些資源浪費，因此可以考慮實施適應個別

差異的學年學分制，以增加學生選課的彈性自由，期能讓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有機會去探索自己的性向潛能。(羊憶蓉等，民84)

基本上傾向於將技職教育排出中等學校教育體系之外。然而1.「學校外的職業訓練機構」的建立，似乎很困難。2.高職的職業訓練除了在早期有明顯就業與報酬率的優勢外，至今有許多科目與學校仍在就業市場上相當受歡迎。進入高職的人，平均在背景與讀書能力上居於相當的劣勢，所接受的又是較差的師資與課程，畢業後較高中生不但不差，其公私立合計的報酬率較高中至今似乎還略高一籌。純就經濟層面而言，不能說技職體系教育缺乏價值。3.綜合高中與「適應個別差異的學年學分制」是我們一致的共識。如果我們承認技職/藝能教育，除了經濟效益與發展技術體系內在生命的長處外，更有其發展個人實務傾向的好處，則似乎可以考慮將藝能性學分納入學年學分制。

林文瑛等人則從自由主義、維持社會正義、尊重個體權利與教育心理學的觀點出發，主張：

過早的課程分化與特定職業訓練式的教育不利於個人的發展與社會人才的培育。..... 教育部對各級各類學校招生與文憑的管制宜逐步放寬，使人才培育能多元化，以滿足社會需求。4.教育政策的制定應以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個人需求的整體考量為依歸，尤應注意教育的本質性目標，不應只以狹隘的經濟利益為規劃基準。5.分流點應顧及個人發展與弱勢階層，儘量延長探索，延後分流。 6.辦一種新一代的高級中學——綜合高中，以適合時代的需要，並減少過去為分流政策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林文瑛，民84)

他們希望照顧個人發展與弱勢階層，主張「儘量延長探索，延後分流」，同時也傾向於廣設綜合高中，乃至綜合大學。他們並不反對校內的技職教育課程，卻反對「二元分立體系下的職業教育」：

我們必須體認，一般課程與職業課程的統整可能是面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有利方向。而二元分立體系下的職業教育將只能成為提供基層勞力的次級教育系統，並終將成為不平等的根源。(林文瑛，民84)

誠如其所言，我們的社會今天也確實應該多給大家一些「延長探索，延後分流」的時間，以發揮個人的才性。然而，有經驗的中小學教師也發現，大多數的學生早在高二之前，已明白表現出愛好實務，或是愛好學理書本的傾向。若非崇拜「讀書人」的傳統觀念，以及文憑主義的影響，其實那有那麼多人真正喜歡讀書、研究學理與上大學。從發展個人真實性向的觀點出發，高二之後的分流教育，也似乎應予慎重考慮。設計良好的「藝能教育」，絕不僅是「提供基層勞力的次級教育系統」，而有其本身的積極意義。綜合高中的理想若能真正落實，至少應有近半數的學生將以校內加上校外的藝能課程為其志趣，而不是幾乎全部都選擇考大學的路。

謝小芩等人則根據實際調查的結果，頗為藝能與技職教育所受的不公待遇抱不平，並請大家正視技職/藝能教育的重要性：

從結構制度到教材師資，教育部對於高中與高職都採取系統性的差別待遇，使得高職教育積弱不振，功能不彰，也強化了人們對高中教育的偏愛。多年來，針對上述問題提出政策建言者不在少數，但卻未獲教育部的積極回應。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民83年）以來，教育部積極推動綜合高中。綜合高中作為後期中等教育的新一種型態，確實有其研究發展與試辦的價值。但是教育部若不改變本身視技職教育為人力規劃工具的心態，繼續為職業學校賦予次等教育的汙名，可以預料，不但高職問題將繼續存在，綜合高中的普通與職業課程也將在內部階層化（internalstratification），而複製高中高職的不平等關係。我們不可忽視，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之下，高職生仍為臺灣的勞動市場提供了眾多的技術人力。當製造業與中小企業仍然是臺灣國際競爭力之所在，高職教育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與重要的貢獻。就教育觀點而言，職業教育注重操作技術的內涵，確實提供了另一種不同於普通教育的學習取徑，讓不同性向與興趣的學生多一種教育選擇，而有發展潛能的機會。在此社會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之際，技職教育也必須要重新定位。（謝小芩等，民84）

他們同時根據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指出實務系統獨立於學理系統而發展的重要性：

近來科學史與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指出，科學與技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但是卻有著各自相互獨立的發展軌跡。以臺灣為例，技術的傳統來自日本，而科學的養分來自世界（多半指美國），二者並無從屬關係，對話也很少（林崇熙，84:12-15）。技術必須在社會產業需求的脈絡中生根發展，但是臺灣教育系統長期輕視技術，自絕於業界，造成產學之間的鴻溝，但也說明了技術獨立於科學的發展性與重要性。這正是區隔技職體系與普通教育系統的意義所在。實用性使其較容易轉化而為產業界所用，但是它的發展並不受限於產業界。（謝小芩等，民84）

以及職業/藝能教育自成體系的合理性基礎：

從這個觀點而言，職業學校作為技術養成的入門與基礎階段，確實可以提供業界基礎人力，然而前者是職業學校的教育目標，後者只是其副產品。從教育的觀點出發，職業學校需要有寬廣的升學進修管道，以求技術的精進與旁通，或再深入技術背後的理論。此外，仔細分析各種技術內涵，找出不能為機器所取代，需要經由操作與經驗累積、具有發展性的技術，作為後其中等教育階段職業教育的重點項目，也是另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謝小芩等，民84）

然而理想的技職/藝能教育，也必須融入自由主義的精神，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技職教育重新定位的成功與否，教育部的基本心態與作法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在政府定位方面，教育部應從管制者與保母角色改變為監督者、協助者與資訊提供者的角色。在法律方面，將職業學校的宗旨，由培養基層技術人員，改變為「培養基礎與多元的技術知能」（或是更周全的目標），修改各種管制性規定。在制度方面，健全技職教育體系，暢通各種進修與終生學習管道。在政策方面，對高職設置類科、招生、經費鬆綁，由學校因應需求自行調整，政府負責監督。課程標準應由職校教師代表、業界代表與學科專家共同制定，加強語文及數學訓練，訂定基本要求，大幅保留職業學校自行發展課程的彈性空間，以照顧職校生能力差異以及地區特色。落實國中職業試探課程，辦好技職學校，使之與普通教育系統得以平行發展，是增加學生學習選擇，紓解升學競爭壓力，養成社會多元價值觀的途徑。（謝小芩等，民84）

他們一方面贊成綜合高中與學分制，一方面也認為在一個真正的多元社會中，獨立的技職/藝能教育，也應有其一席之地。整體而言，他們的重點在為技職/藝能教育大力鳴不平。誠如其所言，「注重操作技術（與實務及才藝訓練）的內涵，確實提供了另一種不同於普通教育的學習取徑，讓不同性向與興趣的學生多一種教育選擇，而有發展潛能的機會」。而同時製造業與中小企業對高職與專科生一直有大量的需求，對其表現亦有多方面的肯定。技職/藝能教育本意並非不佳，問題出在強制性的分流與技職教育長期所受到的歧視與扭曲。技職/藝能教育向來是社會上「讀書人主義」及「士大夫思想」的犧牲品。如果政府與學術界不能主動領導改變這種觀念，則我國的藝能教育，無論是「技職學校」或「技職學分」、「藝能學分」將永無出頭之日。技職體系出來的人受人輕視，而大家一窩蜂湧向普通高中及大學。終將造成嚴重的教育、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心理問題。

另外章英華等人則根據精密的統計資料指出延後分流與廣設大學未必能有效解決升學競爭與家庭背景不平等的問題：

要廢除高職階段的技職教育而讓所有的相應學齡的青少年都進入高中，以人類歷史的經驗來看,有其可能，但是要提供完全的大學教育機會，還是人類未曾實現的願望。當我們達到全面上高中的理想之後,自然會解除現有分流教育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問題,但為著升大學所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明星學校以及升學競爭，以及個人家世背景所造成的機會不平等的問題，並無法解決。增加大學的理想，其目標可能不在解決機會不均等的問題，也不在解決升學壓力的問題。而它對經濟發展與就業問題的解決，也不能提供立即的答案。(章英華等，民84)

所以他們認為真正的重點在於提供高職生以升學的機會，並完善技職/藝能教育體系：

我們對分流教育的批評，不在它是不是升學競爭的原因，而在它可能限制了相當數量高職生升學的機會。這可能是我們要調整高中與高職比更關鍵的因素。(章英華等，民84)

要降低機會不平等性,可以從改革"一試定終身,使下層背景者招淘汰"的缺乏升遷流動之體制著手,在廣設高中大學之外,應該有其他的考量。以目前臺灣升大學的

比率而言，是有可以繼續擴充的可能，而與先進國家相比較，我們經濟能持續發展的話，高等教育也會繼續擴充，而在緩慢的擴充過程中，消解競爭的壓力，如何充實技職教育，如何提高技職體系的升學管道，是必須同時進行的。這可從暢通技職升遷管道進行，如給高職生更多升專科、技術學院的機會，這將以技職教育體系之擴充，能容納更多學生為前題；或者讓高職生有更多考上大學的機會，然而在當前的課程設計下，高職生很難考上大學，除非能降低高中、高職的課程差異。此外技職證照制度的推廣與落實，加強民眾「技職教育的貢獻不輸於普通學術教育」的認識，而提高技職學歷者的職業、收入與社會地位，也是可行之道。(章英華等，民84)

與先進國家相比較，我們經濟能持續發展的話，高等教育也會繼續擴充，而在緩慢的擴充過程中，消解競爭的壓力，如何充實技職教育，如何提高技職體系的升學管道，是必須同時進行的。(章英華等，民84)

廣設綜合高中與調整高中高職的比例的確是目前應採行的政策。然而在一個輕視與忽視藝能教育大環境下，其結果必然是升大學的壓力大增，升學主義與惡補升級。有人提倡廣設大學，然而廣設普通大學所牽涉的問題重重，並且可能造成嚴重的教育、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心理的不良後果。我國高等普通教育，固然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繼續擴充。然而其所能增加的名額，一時也有限。改善高中階段的「藝能教育」、廣設技術學院與改善現有專科系統，可能更是當務之急。

二、如何因應改制後所可能發生的新問題？

大體上我國分流教育的規畫除了因應經濟需求外，從一開始便是為了對付國人之「士大夫思想」、「讀書人主義」、與「文憑主義」而生。在民國五十與六十年代，學生與今天一樣一窩蜂的追求較高的學位，結果是大量的技術工作找不到適當的人才，而大量的高等教育畢業者找不到適當的工作。¹⁵這個情形隨著經濟的發展，在民國

¹⁵1. 「如1960年代起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專門技術工作機會創造不足，亦使高教育謀職者找不到好工作」(章英華等，民84) 2. 「教育與職業取得的關聯，取決於經濟發展所引發的教育擴充與職業結構變遷之

七十年代之後得到好轉。然而目前又開始出現問題。隨著經濟的提昇，國民的教育水準，也自然應當提昇，分流點也可以適當延後。目前不合理的高中高職7/3比更應當大幅修正。然而如果我們今天如果不重視藝能教育，全面廣設普通高中、大學。則非常可能再次產生大量受過高等教育但不適業的閒置人力。找不到適當職業的大學畢業學生，將湧向研究所與國外，或是怨天尤人，鬱鬱難安，重演民國五十與六十年代的問題，只是規模擴大，而平均的受教育程度更高。

大體而言，未來的綜合高中如果不大力加強技職教育的地位，則技職學分或技職班一樣為人輕視。學生無論性向適不適合，必然湧向普通教育體系。普通班的高中生可以增加至目前之2—3倍，則升大學的壓力大增，惡補、升學主義、與教學的扭曲只會更嚴重。同時，廣設綜合高中後，學生仍將湧向明星高中與一般學校中的升學班，不僅會產生許多「放牛高中」與「放牛班」，初中的升學壓力仍難以解除，而升大學的壓力驟增，整體教育的扭曲也只有加劇。許多人於是主張普設大學。然而政府的財力不足以廣設公立大學，必須大量設立私立大學。然而除非採取高學費政策，私立大學難以辦好。而高學費政策，卻又造成機會的不公平。如果壓低學費，則恐將產生不少「野雞大學」。而無論任何情況之下，一般高中生仍將湧向明星大學，考大學的壓力仍然很大。¹⁶

雙重結構變遷。隨著台灣在1960年代起的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高地位的專門技術職業之就業機會並沒提高多少。A隨著經濟發展、教育擴充而來的受過大專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之求職者，就無法繼續擔任高地位職業，而以地位較低的監督佐理人員、買賣工作人員、服務工作人員、以及生產體力工為職的比率則隨之上升，與高中、高職者的差距，乃逐漸下降，這反映在3-3(A)方程式(1)上，大約於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到了極點的1970年代末期，或1980年代初期任初職的45—50年次組的大專以上學歷者初職與高中、高職的差距比44年次以前的差距小之上。不過，台灣的經濟發展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後，工業邁向升級與服務業之擴充，帶來了許多高地位的專門技術職業的就業機會，使得大專教育程 龔，特別是大學教育之求職者，又能找到好工作，與高中、高職者的差距也就回昇了，這反映在大約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任初職的51年次以後之大專以上學歷者初職與高中、高職的差距比45—50年次的差距為大之上。」(章英華等，民84)

¹⁶請參考：1.本文第四節第一部份。2.「當大學招生的數量一定的狀況下，增加高中相對於高職的學生量，仍無法減低學生升大學的意願，而要求進入擁有高入學率高中的情形也不會減低。升學的競爭不在於國中之後的分流，而是大學數量的問題。但是我們大學的招生數量可以達到什麼樣的地步呢？假設我們能從現在高中畢業年齡者百分之十五進 大學的比率，提高到日本的百分之三十，是否就能減低升學的壓力呢？百分之三十仍是少數人能夠進大學的情形。而一個社會對大學常會形成高低的評價，明星大學仍舊是競爭的標的。以日本的情形而言，在1980年代中期，初中生進補習班的比率是44%，而東京更嚴重，47%的國中二年，67%的國中三年生參加了補習班（Howarth,1991）。只要是大學的分級明顯，進入明星高中的意願依舊存在，升學競爭還是沒有辦法

「知識份子主義」與「文憑主義」是學生湧向普通高中與大學的根本原因，而他們並不會簡單地接受市場調節。誠如章英華等人的研究所顯示：

在台灣社會，”高學歷者不但初職高，升遷機會大，現職也就較高，因而得到高收入，即使現職與低學歷者一樣，高學歷者的收入也較高”然而，教育的價值還不只是某些學者所說的，只是提高職業、收入而已（黃武雄，1995b；郭慧英，1995），其本身就能代表著社會地位。教育有那麼高的價值，這反應出淵遠流長，根深蒂固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重視教育價值觀與文憑主義，在社會大眾都重視文憑的情況下，爭取文憑也就成了提高職就業、收入，與社會地位的最有效途徑，文憑主義與爭取文憑所需的升學競爭，也就隨著經濟發展，民眾有更多資源爭取文憑，而持續高漲。即使台灣民眾經常面臨高等教育文憑大幅擴充，所帶來的”高學業與高失業，低職業”之問題，文憑主義與升學競爭也不會減輕多少，因為即使高學歷不會帶來高職業、收入，本身還是能代表著高社會地位。既然教育或文憑本身就代表著很重要的社會地位，很明顯的就業競爭並不是文憑主義與升學競爭唯一根源，而我們社會長年累積的”重視學校教育”的價值觀反而更為關鍵。（章英華等，民84）

許多人樂觀的以為，大學生大量過剩之後大學文憑不值錢，則文憑主義終將式微。然而任何社會終究是需要一些擇才的標準，我國會走向文憑主義，主因在於國民性好結黨結派，任用私人，平素又缺乏理性主義、敬業精神、與對超越或永恆價值的信仰，看人看事常憑主觀直覺，除文憑與資格之外，一般更難找到一客觀服人的標準。廣設高中大學，並不能解決文憑主義的問題，反而會使文憑主義升級，使高中及大學的文憑缺乏價值，「有志之士」追求更高的文憑。我國的歷史經驗便是如此，早年大學生在各機關學校及私人公司做領導毫無問題，現在的政府機關與學術機構則非博士難以高昇，私人公司主管也往往要求碩士學位，文憑主義已然升級。¹⁷廣設大學只會加速這個趨勢。

實質減緩的。」（章英華等，民84）部份的緩解之道可以是：「明星高中與大學各國都有，勢所難免。然而目前的標準，太偏向狹隘的考試內容，明星高中更是只偏重成績與升學率，這就大有問題。聯考而不聯招，擴大並開放各校擇才的標準，或許是較好的辦法。」（章英華等，民84）

¹⁷坦白說，我們今天在座的人會有機會參與教改的決策，這本身也深受文憑與資格主義的影響。我們為

在這種情形底下，如果期望教育的內涵能夠改善，眾多學生的才性與全人格可以得到健全的發展，不啻緣木求魚。誠如章英華等人的研究所指出：

在文憑主義之下，大多數人上高中大學，所謀求的僅是文憑所帶來的職業、收入與社會地位，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畢業與文憑，而不是全人格發展，而在台灣的教育體制，特別是在配合廣設高中大學而可能實施的教育市場自由化，把教育當成一般商品，鼓勵私人從投資興學賺取利潤辦所導致的"學店廣設"之情況下，實在很難想像學校會嚴格要求學生們達到全人格發展才可以畢業。其實我們的大學已經沒有升學壓力了，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是不是全人的教育，都是個問題，而全人教育只是單純的以升學管道的暢通與否作為前提，能並無法完全解決問題。大學教育是否能往全人目標的發展，可能是必須先努力的目標。若是大學與全人教育的理想無法銜接時，擴充教育的結果，可能仍是地位取向的再度強調，更壞的是可能有相當數量的學生仍舊以文憑為依歸，並不在乎學到了什麼。(章英華等，民84)

延後分流與擴充普通教育對問題的本質一點都沒有改變。

就事論事，我國目前的經濟結構最需要的仍是大量能配合工商服務業的專科或技術學院程度的技術人才。章英華等人的研究指出目前大學教育目標的混沌的與功效的虛浮：

比起二三專，大學以上學歷者由於文憑高在初職佔盡優勢，然而現職的優勢卻縮減許多，這可意味著大學以上文憑不一定能代表工作所須要的專業學能，以目前所須要的技術水平，屬於技職教育的二、三專反而可能較實用。研究發現顯示屬於普通學術教育的高中，大學以上學歷者的職業優勢並不大，即使有些優勢，主要可能是文憑主義，而非能適應就業市場所致。通才與專才訴求的討論，不在廣設高中大學與否，而是在各級學校教育的實質內容，就如前面所說的，我們的大學是通才教育或職業分流教育，在目前似乎仍混沌未明。(章英華等，民84)

何不找一群高初中，高職，與專科的老師，卻拉了一群大學教授來參與甚至主導決策呢？這本身便有問題。

他們同時指出擴張高等教育所可能產生的經濟與就業問題：

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高等教育的擴張，未必就會自然增加出相應的就業機會。如果廣設高中大學，教育擴充太快，就業市場來不及擴充，”高學歷、高失業”的問題並非不可能。另一方面，若沒有高失業的問題，當就業結構在層級上未能提升時，高教育低職業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即使所教育出來的通才有全人格發展，能適應就業市場的技術快速變遷，也會因為高才小用的就業或失業，而無法發揮學能，而難以促進經濟發展（Hage,Garnier,and Fuller,1988；黃毅志,1994）。只有我們在擴充高等教育之時，能同時發展出，使人們從高等教育中學習到自得的人生態度，教育擴充與職業提升的配合與否可以就不那麼重要了。（章英華等，民84）

「教育與經濟發展並不直接關聯的心態之論」，確實是人生應有的理想，然而大多數人在可見的未來也實在難以做到。有的學者說，高學歷高失業率不是問題，問題在高學歷者不肯放下身段去作低學歷便可以作的事。然而將心比心，奮鬥與「投資」了十餘年，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了，卻去做小學或是初高中畢業便可以作的事，除非有聖賢般的修養，或是較特殊的人生觀，絕大多數人將會有非常深的挫折感。「學習自得的人生態度」，並不需要高等教育。至於把受高等教育當作一種享受、人生經驗、或是自我提昇的過程，而不在意未來的職業，只有在經濟與文化高度發達，生活優渥、重視人生品味、個人自主意識極強的社會中才能勉強做到幾分。我國社會，完全沒有這些條件。¹⁸在經建會與其他研究機構紛紛提出警訊之時，大學有多少擴張的空間，仍須從長計議。比較適當的作法，似乎應當是大力加強技職/藝能教育系統，提昇其教育的內涵與素質。一方面走實務的路，一方面則要全力地加強其人文與藝術的修養，以提昇國民的文化水平。在綜合高中內便鼓勵學生按自己的真實性向來選擇未來，而不要一窩蜂擠向大學聯考。同時普設技術學院，或技術大學，並使其密切與產業界結合。使走技職體系的人有良好的升學管道、前途，與文化素養，則種種不平衡的現象，應當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抒解。

¹⁸論者又以為英國教育採菁英主義，其大學生佔同齡人口的比例低（25%），所以產業不如美國發達。然而德國教育系統中菁英主義的情況更嚴重，小學五年級便開始分流，其大學生比例也低（28%），

產業卻十分發達。可見關鍵因素並不在此。